两会点题 减负

培优班、冲刺班让孩子疲惫不堪。多位政协委员呼吁——

家长别被培训机构牵着跑

本报记者 柯进

“辅导班挤占了课外时间，中小学生‘白加黑’‘五加二’是常事，很少有中小学生不在校外补习的，很少有孩子可以在晚上10点前睡觉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说。

中国教育学会不久前发布的报告称，2016年我国课外辅导行业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参加学生超过1.37亿人次，辅导机构教师约700万至850万人。报告同时显示，参加课外辅导的学生约占全体在校生总数的36.7%，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0%。

对此，陈众议建议，国家应当对针对中小学生的各种培训班、辅导班予以限制。否则，“久而久之，孩子们就变成了‘刷题机器’，精神上成了长不大的巨婴”。

陈众议分析说，为减轻中小学生的学习压力、推行素质教育，20余年来，我国多次出台“减负”政策，在课内减负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课外培训机构越来越多，打着“赢在起跑线”“推优集训”“对口培训”等各种名目吸引生源，并有进一步向幼儿阶段蔓延的趋势，这种现象导致减负变增负。

“只要你稍加留意，每晚九十点钟，都会有大批孩子及家长背着沉重的书包，涌出培训班、提高班、培优班、冲刺班课堂。”陈众议分析说，这严重挤占了中小学生的课外时间，使学生、家长承受着经济、精神、体力和时间上的多重压力。

不过，也有委员表示，校外辅导机构本身并无“原罪”。“校外辅导教育市场的存在，有一定合理性。”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认为，课外辅导可以满足不同孩子个性化、多样化的学习需求。课外辅导是不是增加了孩子的负担，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如果孩子有兴趣，就不会觉得是负担。其二，孩子的负担取决于家长的目标，现在所有家长都把孩子的目标定为上名牌大学，这就造成了负担。”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认为，优质教育资源难以满足公众的迫切需求，这就使得不同类型和规模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大量涌现并迅速生长。对于目前广受社会诟病的校外辅导机构所存在的各种乱象，钟秉林说，首先要完善教育培训规范管理机制和市场竞争机制，其次要加强师资能力建设。同时，民办教育培训机构要转变观念，遵循教育规律，坚持以质量求生存，处理好公益性和营利性关系，把精力真正放到改善培训品质上来。

陈众议则将教育内部的改革作为根治“减负难”问题的重要政策选项。他建议，相关部门一方面应着力限制和规范针对中小学生的各类培训机构，另一方面要尽快出台初中百分百就近入学政策。在此基础上，中高考应以中小学课本为导向，取消或减少与课内学习无关的各种题海战术，这或许是现阶段减负的有效办法。

减负当立足供给端改革

湖北省襄阳市教育局局长 程敬荣

现在，学生的学业负担之所以重，主要有社会、家庭、学校、教师和学生等因素。社会因素方面，受片面的人事制度和普遍存在“应试倾向”的考试评价机制影响，社会竞争异常激烈。我们给学生安排的学习任务太多，有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学校课程，而且内容多、头绪多、难度大，存在繁难偏旧等现象，考试评价方式也相对比较陈旧。比如，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等，小学有13个学科，初中达16个学科。同时，名目繁多的“进校园”活动实际上也干扰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

减负究竟应当减什么？一是减去繁难偏旧的教学内容，严格控制教学科目与各个科目教学内容的总量；二是引导社会形成更加开明的人才观念和教育观念，合理减轻社会和家庭对孩子们的过高预期与压力，给学生一个比较宽松的成长环境；三是切实改进社会对学校和教师的评价标准，减轻学校和教师的负担，使之能理性从容地开展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四是严格控制和规范各类考试、竞赛的次数和难度，切实改进考试升学录取方式，使各类人才竞相涌现；五是提高教师教学业务能力，改进课堂教学方式，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六是严格规范课外作业的难度和数量，改进单一的作业形态，增加实践和体验性作业的比例，提高练习效能；七是改革社会人才评价使用和分配机制，让各类人才都能出彩；八是减少行政干预，规范各类“进校园”活动，减少学校师生额外负担，保持校园相对宁静。

（本报记者 柯进 采访整理）

■代表委员说

古丽努尔·买买提代表：

设立内地新疆高职班

本报讯 （记者 蒋夫尔）目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普通高中毕业生数量呈迅猛增长态势，预计2020年将达12万人，毕业生将面临空前的升学压力。全国人大代表，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古丽努尔·买买提建议，应设立内地新疆高职班，为新疆培养高水平技能型人才。

古丽努尔·买买提建议，由国家在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中确定一批，承担内地新疆高职班办学任务，为新疆培养高水平技能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也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助力。

杨学义委员：

“一带一路”急需新型高校智库

本报北京3月8日讯 （记者 施剑松）全国政协委员杨学义建议，应当从国家层面鼓励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新型高校智库的建设和发展，并给予政策、资金、人才、技术方面的支持。

杨学义认为，教育部可会同外交部、文化部等相关部门及社会团体，共同探讨、总结国内已有新型高校智库开展人文交流、助力民心相通的发展模式以及高校智库发展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杨学义建议，由教育部或是基于一定共识成立的民间组织牵头，成立高校“一带一路”智库效果评估机构，对众多智库的工作模式和发展成果进行效果评估及相应奖励。

任芳委员：

扶持一批非营利性高水平民办高校

本报讯 （记者 张滢）“一是经费不足；二是生源结构不合理，高职学生过多；三是社会认可度不高，申请项目非常困难。”谈及高水平民办高校办学面临的三大难题，全国政协委员、西京学院院长任芳建议，有关部门可以制定“非营利性高水平民办高校建设项目”，扶持一批基础好、影响力大的非营利民办高校。

任芳认为，如果有关部门能够从分类指导中制定一系列适合高水平民办高校的激励、引领性政策，让公办、民办均衡发展，就一定能让高水平民办高校坚定走非营利性发展道路，并成为民办高校发展的主要力量。

会后忙碌

3月8日，小组讨论结束后，全国人大代表、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冯丹（左）接受媒体采访，全国人大代表韩进（中）与同事交谈。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教育界委员在讨论预算决算报告时，印杰委员提出——

少些项目拨款，多些经常性预算

本报记者 高靓

“我想说说预算执行的事。”3月7日上午，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教育界别42组讨论预算决算报告时，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科技大学副校长印杰积极要求发言。

“近几年，教育经费增加了，但是基层单位到了年底经常面临一个困难——经费预算执行不完。”从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到上海科技大学副校长，印杰对这个问题感受突出，“不是因为钱多花不完，而是因为能花钱的时间太短。”

印杰解释说：“国外的制度一般是预算年度比行政年度晚几个月，比如美国、日本都是从4月开始。我国的预算年度与行政年度一致，都是1月到12月，但实际大规模的经费批下来往往要等到每年3月两会以后，到11月底前就要把所有项目做完，有效时间只有8个月。”

“现在，预算管理越来越严，特别是很多专项经费使用时需要大量程序。比如，装修一栋校舍，从设计、招标、报备、拿到施工许可证再到施工，一年可能是无法完成的。”印杰说，“今年，上海市人大把预算执行情况全部公开，教育只有92%，没有全部执行完。”

坐在对面的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插话说，为了应对这个情况，高校现在只能把工作都做在前面，建一个项目库，把项目都预先做好，需要时调用，以减少准备环节。

印杰认为，国家对预算管理越来越严格，这是十分必要的。他建议，基层单位要把预算做得更加准确，提高执行力。同时，政府在预算执行问题上也应该实事求是，有些项目需要跨年度，就不要一刀切。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建议尽量减少项目拨款，增加经常性预算。现在，大量的专项经费要经过申请、评审，再到花出去，行政成本很高。比如，刚才说的校舍问题，应该由校长来决定，而不应该是政府部门再来设一个专项。”印杰说。

针对未成年人犯罪危害严重现象，王长华委员呼吁——

防治校园暴力要用好法律武器

本报讯 （记者 王强）“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都有关于父母监护教育责任的专门条款。如果缺乏有效的、可操作性强的法律追究，这些规定就可能只是一纸空文。”全国政协委员、河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王长华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对于未成年人的8种严重犯罪，父母没有尽到监护职责的，应该对其父母予以法律追究。”王长华认为，在法律层面，除了父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之外，还可以考虑对父母实行“罚金”等刑事处罚，以警示父母的监护教育责任。

在王长华看来，正是由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成本低”，所以现有法律法规对其震慑效果很有限。

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均有对18周岁以下犯罪者从轻处罚的相关条文，致使对不满14周岁的故意杀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轻伤害行为难以追究刑事责任，甚至不能进行治安拘留处罚，相当一部分校园暴力事件只能在教育机构内部处理。

对此，王长华建议，对未成年人严重犯罪的，可以考虑降低刑事责任能力年龄。“可以将刑事责任能力年龄降低到12—14岁，并且对于从轻、减轻或免除情节要严格限制，以真正树立起此年龄段人员对法律的敬畏、对生命的敬畏。”王长华说。

此外，他还建议，要把未成年违法犯罪者的矫治措施落到实处。对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应考虑一律送专门学校或工读学校予以教育矫治，不能放任自流。

我国《刑法》规定，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时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但何谓“必要时”，以及家长应如何管教，并不明确。同时，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对于在学校接受教育的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学生，无力管教或者管教无效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将其送专门学校（即工读学校）接受矫治和教育。

“由于该措施非法定强制性措施，而是由监护人或原所在学校提出申请，加之当前工读学校的数量正逐步减少，因此实际走进工读学校的‘问题少年’有限。”王长华认为，目前迫切需要落实和完善收容教养、工读教育等制度，明确实施细则，加大对相关矫治场所的资金、人员投入，用足用好我国已有的制度资源。

■两会关注

传统文化教育，中小学该做哪些『功课』

——访全国政协委员、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牛汝极

本报记者 蒋夫尔

对中小学来说，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了一项需要认真做好的基础性工作。那么，中小学该做好哪些“文章”呢？

日前，记者就此专门采访了热心并高度关注传统文化教育，在2016年全国两会上提交了《关于重视中小学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提案》的全国政协常委、民进新疆区委会主委、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牛汝极。

牛汝极告诉记者：“要让中小学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真正落到实处，必须要将之融入各科教学中去，分学段有序推进。”

牛汝极进一步解释说，分学段有序推进是针对不同层次青少年学生的接受能力，有重点地选择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追求学用一致的育人效果。

“小学以培植情感为主，可以开展优秀传统文化启蒙教育。一方面，让孩子从小养成诵读国学经典的习惯；另一方面，学习书法，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牛汝极解释说，所谓书，就是文字、记录；所谓法，就是法则、规矩、模式。书法要求按传统规范书写汉字，在反复练习中，少年儿童能加深对汉字的理解和研究，便于准确表达。

那么，初高中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又该如何推进呢？牛汝极认为，应以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力为重点，注重认知与行为的结合，珍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从各种文化体验的感悟中提升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归属感。

“对初高中生，还要以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为重点，引导学生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认识国家前途命运和个人价值实现的关系，建立文化自信，使他们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国家尊严和国家的核心利益。”牛汝极说。

牛汝极表示：“一旦融入到中小学各学科教学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就有了抓手，就能慢慢扎下根来。”

“除了课堂主渠道之外，青少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还需要丰富多彩的活动作为载体，通过实践活动，让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滋养青少年成长的充足养分和精神食粮。”牛汝极说。

牛汝极认为，中小学可以开展3方面的活动，并以此作为载体，让青少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更加深化、形成体系。

一是开展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重点的家国情怀教育活动。学校可以从爱国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学习了解做起，可以从学习现实生活中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做起，奠定爱国主义情怀的基础。

二是开展以“仁者爱人”为重点的社会关爱教育活动。要在青少年学生中积极提倡随手公益，节约用水用电用粮，力所能及参加社会慈善、环保公益活动，提倡“日行一善”，把做好事、帮助他人当作习惯，培育尊重自然的生态文明意识和乐于助人的奉献精神。

三是开展以“正心笃志，崇德弘毅”为重点的人格修养教育活动。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精髓，青少年学生的修身，旨在培养积极进取的健全人格，首要的是正心笃志。“吾日三省吾身”就是提倡经常自我反省，虚心接受他人批评，正确客观看待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这对成长中的青少年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履职五年间

全国政协委员张杰庭：

我的提案都接地气

2003年，我成为全国政协教育界别第一个来自民办教育界的委员。后来，俞敏洪、杨文等委员陆续进组，到第十二届全国政协，来自民办教育界的委员已经有10多位了。虽然我们在全国政协教育界别100多位委员里，人数还占绝对少数，但感觉国家对民办教育越来越重视了。

连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共提交了50多份提案。每一份提案提交前，我都会充分调研，时间不少于两个月。可以说，我的提案全都接地气，反映的是实实在在的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有可行性的建议。

2015年，外教供需比例严重失衡，民办校都在抢夺外教资源。外教质量参差不齐，影响了我国外教管理体系的有序发展，也与我国现行的外籍文教专家聘用渠道、标准、管理办法等产生了巨大矛盾。我提出《关于构建外籍教师管理体系和市场运作规范的提案》，得到了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外国专家局的高度重视。

2016年，针对公办学校举办国际班（国际部），利用学校品牌高收费、导致并加剧教育不公平、挤占社会公共资源的问题，我提议坚决抵制这类现象，规范公办教育办学行为。

今年两会，我带来了两份提案。一份是《关于调整一线城市义务教育、学前教育建设标准，节约国家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提案》，还有一份是《关于落实“让非营利性的民办学校教师享有与公办教师平等法律地位”的提案》。

当前，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土地资源稀缺，而各类教育场所建设标准容积率规定太低，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位数量的增加。因此，我提议调整一线城市义务教育、学前教育建设标准，提高土地利用率。现代建筑和环保技术的发展，能够为容积率提升提供保障。

提议让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教师享有与公办教师平等的法律地位，同样源于对民办非营利学校教师和公立学校教师退休待遇的了解。在一些地方，同样教龄、同样职称的教师，从事相同的工作，公办教师退休后待遇比民办教师高一倍以上，针对此，我提议政府应给予非营利性民办学校退休教师相应的补贴。我认为，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民办教育一定不能缺席。

（本报记者 施剑松 采访整理）